

地方首长选拔逻辑： 怎样的官员适合做救火队长

人事盘子进入新一轮密集调整期。因反腐等多重因素影响，催生了罕见的人事变动。2014年以来，已有十余名省委书记被查，而离其5年任职期均有一半时间，形成如今多地省委常委领导班子补缺调整的状态。

统计发现，2014年，仅湖南、陕西、重庆、天津、山东等5省(区市)常委领导班子未有调整，其余26个省委的常委领导班子均有变动，共涉及65人。其中31人系今年的新晋常委，占比近一半。这31人中，本省新晋常委11人，其中有4名“戎装常委”。而从中央单位调任地方的“空降”常委和异地调任的常委，达20人，约占2/3。

本文仅就涉及贪腐地震和因此联动的人事调整加以分析。因为对于“救火队长”的选配，可以看出中央心目种官员可以“临危堪大用”，成为未来政治梯队中脱颖而出的政治人才。

省级大盘求稳 60后依旧难出头

当下中国已经有60后政治局委员、60后省长。但目前而言，60后官员群体在地方执政层面依旧难以形成数量上的跃进与全局性的突破。在此番人事调整之前，地方上执政中坚依旧是50后。即便在此次大调整之后，60后也依旧难以出现新飞跃(晋升省部级正职行列)。

此番涉及省级正职的调整体现了中央层面企稳的思路，即书记与政府首长没有同时更换，一般配备为新人与老人的组合。

例如山西方面，只更换了一把手，由王儒林调任山西省委书记，省长依旧由李小鹏担任。而递补吉林省委书记的则是吉林

省长巴音朝鲁，接替巴音朝鲁并担任代省长的蒋超良则属于空降兵。云南方面，秦光荣被调走后，长期躬耕西南边陲的省长李纪恒顺位接任书记，陈豪则又是一名空降兵——从全总空降而来。

此外，递补与晋升人选也均为政治经验更为丰富的50后。四位调整的省级正职都属于50后，除王儒林之外，其他三名官员都是首次担任省级党委(政府)正职。

考虑到一般规律，这些官员抓住当下机遇，仍有进一步获得提升的机遇和机会。经过此番历练，他们使得自己的政治履历更加完备，增加了备选几率。

吉林省省委副书记的蒋超良是正职调整中唯一发生级别的变化的官员——副部级晋升为正部级。此番调整后，不仅是蒋的级别有了突破，履历也进一步丰富，使之获得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备履历。由于早年蒋曾担任过湖南省副省长(2年)，经此晋升也获得了省府副职和正职的履历。

不具一格的用人魄力

此番调整中，由全总空降的陈豪也获得了省级正职的锻炼机会。陈豪已通过全总的履历完成了级别晋升。陈豪此前长期在上海工作，年轻时就脱颖而出，被称为“年轻的老干部”。

陈豪自1997年开始担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此后又担任上海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0年陈豪调任中央工作，担任全总副主席。而此番调整使得陈豪的履历更为完备，不仅有发达省份的履历，还有西部省份的履历。

这样的政治经验符合习近

平一直以来倡导的用人思路。而这样的锻炼，也使官员更容易在政治锦标赛中脱颖而出，获得晋升省府班长或中央职务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走完相关法律程序后，仅为十八大代表的陈豪有可能成为31个省份中第三位非中央委员会成员(委员、候补委员)的省府班长。2012年12月和2013年1月，既非十八届中央委员、也非中央候补委员的杨雄、魏宏相继主政上海市政府和四川省政府。

“双非”体现了本届领导人别具一格的用人思路。破格任用“双非”，一方面彰显了用人的魄力，另一方面，这些不拘一格的调整也是对既有人事格局的一种补充与调试。

异地与空降 重塑地方政治生态

反腐同样是重塑地方政治生态的战略机遇期。而这其中，以人事变动为契机、改变本土势力对政治生态健康的威胁，是一个重要方面。

随着中央用人格局的完善，省级层面很难再出现本地人担任省委正职的情况。但是诸如山西等省份，其省委常委中本地籍贯人较多的局面还没改变。由此，空降官员与本地官员之间的冲突与掣肘在所难免。

而山西官场经过雷厉风行的反腐和调整后，四名山西籍常委落马，三分之二的常委被调整(除去军方常委)，扭曲的政治生态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取而代之的是，由书记到常委的8名空降和异地调整官员。山西的人事调整带有明显的物理隔绝效应。中央通过人事调整为抓手完成了与山西旧有官场的切割。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霍克1月16日晚落马，此时距离1月14日国务院公布任免令刚刚过去了2天，距离2014年12月17日他的名字出现在国家旅游局网站刚刚1个月。

十八大以来，这种“五日京兆”式的政坛“短命鬼”记录屡屡被刷新。

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自2012年11月14日当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到当年12月2日落马，只过瘾了18天。李春城十六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大落选，十八大在周老虎的推力之下时隔五年重新当选。想想昔日为了升官而为周老虎家族鞍前马后的卖命，只换来18天，这买卖真是赔大发了。

周老虎的另一马仔蒋洁敏2013年3月从中石油一把手调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半年之后于9月落马。但好歹“享受”了半年的正部级待遇。较之李春城永远与朝思暮想的正部级无缘，蒋洁敏还不算太亏。

近日，某大单位副政委履新13天后就落马，在副大军区级的位子上仅仅“风光”了13天，创造了军队反腐史上的记录。1月15日，军队权威部门公布了2014年查处的16起军级以上干部腐败案件。其中唯一已被判刑的陈强，就是该副政委在提拔之前原单位的同事。

“调虎离山计” 造就政坛“短命鬼”

范长秘、于大清也出现在16人之中。两人的命运极其相似，往昔都平步青云，2012年分别由第47集团军政委、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晋升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炮兵政治部主任。在中国军队，参谋长与政治部主任往往被视作司令员、政委的第一“备胎”，虽然排名在副司令员、副政委之后，但由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直升军、正主官的例子比比皆是。范长秘、于大清二人彼时一定是志得意满。不过好景不长，2013年12月和2014年7月，于、范二人相继被改任二炮副政委、兰州军区副政委，实际是投闲置散，离开了关键核心岗位。

这种“调虎离山计”在十八大以来的打虎风暴中屡试不爽，查处范长秘、于大清、蒋洁敏都是如此。从打虎章法上来看，习王组合张弛有度，动静结合，缓急相济。在查办大老虎之初先从外围入手，剪其羽翼，研其枝蔓，逐步缩小包围圈，到了收网之时，遂青锋出鞘，一击中的，绝不拖泥带水。

“调虎离山计”是有着精妙的战术计算的。有些“大老虎”、“老虎”之前处于党政军权力运行的核心岗位上，在信息获取方面有独特优势。如果就贸然去查，未免打草惊蛇。“老虎”或是利用职权打探消息，或是隐匿销毁证据，反而会干扰办案、增加工作难度。

譬如霍克所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号称“天下第一局”，直接负责中枢文件运转、最高层会议安排等机密业务。将其“调虎离山”，离开老巢，无疑是一招妙棋。令计划2012年被调离中央办公厅，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终于也在两年之后被中纪委查处。令计划从1995年至2012年一直在中办任职，与霍克交集极深。

1月12日至14日举行的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共有125名中纪委委员出席。相较于2012年十八大时选举产生的130人，少了5人。

经过梳理发现：5人之中申维辰、梁滨已开除党籍，自然无缘与会。缺席的3人，一是原中纪委常委、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总政治部纪检部部长刘滨，已调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二是原中纪委书记王伟，已调任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第三位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仲田。

王仲田原系中央党校教授，后调入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担任过中办调研室政治组副组长，同期令计划担任中办调研室副主任、中办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王仲田后来调任中办秘书长，2011年晋升中办副主任，成为中办主任令计划的副手，而接替其担任中办秘书长的正是霍克。

从霍克、范长秘、于大清等人的下场来看，当今的打虎根本不存在所谓“平安着陆”或“过关”之说，只要违法违纪、触犯党纪国法，即使短期看似乎“平安无事”，但或许只是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

(马浩亮)

官场如何选出“救火队长”

家领导人行列。

而在2008年震惊全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原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被免去领导职务，承德市委书记艾文礼接任石家庄市市长。2011年末，完成“救火”之职后，艾文礼升任河北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暴中，在黄莉新之前，也有省部级高官异地“救火”。2013年10月28日，时任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次月，六盘水市市委书记王晓光调任遵义市委书记，并于去年4月实现仕途进步，升任贵州省省委常委。

盘点这些异地调任的“救火队长”，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多数都与“救火地”有过交集。比如王晓光“救火”担任遵义市委书记时，就并不是他第一次到遵义任职，2006年到2011年间，他就曾在遵义工作，先后担任常务副市长、市长等要职。新任南京市委书记黄莉新，虽然此前并无在南京市党政系统工作经历，不过盘点其履历，却可以发现另一个信息——从1983年参加工作到2011年12月开始出任无锡市委书记为止，期间她一直在省会南京工作。

一般认为，上级选用对“救火地”工作情况较为熟悉的干部赴任，有利于尽快接手工作，最大程度消解前任“出事”的影响。不过，过去规格最高的“空降救火队长”，还是张德江和尉健行。1995年5月，中央政治局

使当地经济社会重上轨道。这或许是如此异地调任“救火队长”的题中之义。

上级“空降”最常见

其实，在异地“救火”之外，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方式——“空降”。这种安排原因也不难理解：“救火队员”来自上级机关，代表的是上级权威，对妥善安排好权力过渡，尽早恢复当地官场稳定大有裨益。

比如上文中提到的2008年三鹿毒奶粉事件，在时任市长去职的同时，时任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亦同时被免，当时的河北省委副书记车俊于当年9月主政石家庄市委直到2010年6月。完成“救火”任务后，车俊2010年调任新疆，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当年9月明确为正部长级干部。

无独有偶，现任青海省委书记、西宁市委书记王建军也是由省委副书记任上“空降”兼任“救火队长”。原任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去年4月24日被中纪委宣布接受组织调查，5月14日，青海省委副书记王建军，受命兼任西宁市委书记。

不过，过去规格最高的“空降救火队长”，还是张德江和尉健行。1995年5月，中央政治局

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落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及时补缺“救火”。2012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查，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暂代重庆市委书记半年多。两位高级别的“救火队长”在完成任务后，分别在随后的中共十五大、十八大上当选政治局常委，进阶中共最高领导层。

本地官员暂代“非主流”

除了上述两种比较常见外，“救火队长”还有一种“非主流”的方式——就地选拔。

有分析认为，依照官场规则而言，如果“一把手”因为腐败被查，当地其它官员难以完全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即使没有参与腐败，也有失察、知情不报的责任。在这种当地官员很难被信任的情况下，上级一般不会考虑本地人选拔后任。

因此，如果出现本地官员暂代“救火”，前任多不是因为涉及贪腐被查。这从不多案例中可见端倪。

2004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因身体状况欠佳，时任省长卢展工“救火”，代理省委书记，在当年末，卢展工由代理书记转正，任省委书记。成为中国政坛为数不多的“非典型”的“救火队长”。(三实)